

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基层治理中教育赋能的三重时间维度

熊孝康

海南开放大学，海南 海口 570208

DOI: 10.61369/RTED.2025290032

摘要： 研究基于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剖析乡村教育与基层治理的百年变迁，重点探讨了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的演进过程。长时段视角下，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及文明形态的缓慢演变深刻影响了教育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中时段分析揭示了政策工具调整与治理目标升级对教育赋能模式的影响。短时段研究则通过定县实验、边区农村建设等案例，展示了教育赋能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与成效。教育是基层治理的前置性与柔性引导力量，“数字下乡”须加强技术普惠与多元共治，以促进乡村振兴。

关键词： 文字下乡；数字下乡；基层治理；历史时段理论

From "Bringing Literacy to the Countryside" to "Bringing Digitalization to the Countryside": The Three Temporal Dimensions of Education Empowerment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Xiong Xiaokang

Hainan Ope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0208

Abstract: Based on Braudel's historical time theory of the Annales School,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entury-long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evolution from "Bringing Literacy to the Countryside" to "Bringing Digitalization to the Countryside".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the slow evolution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social structures, and civilizational forms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Medium-term analysis reveals the impact of adjustments in policy tools and upgrades in governance objectives on the model of education empowerment. Short-term research, through case studies such as the Ding County Experiment and rural construction in border regions, demonstrates the specific practices and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in empower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Education serves as a preemptive and flexible guiding force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digital penetration into rural areas" necessitates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inclusivity and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bringing literacy to the countryside; bringing digitalization to the countryside; grassroots governance; historical time theory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治理有效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保障。从民国时期的平民识字运动，到新中国初期的扫盲运动，再到如今数字乡村建设，作为现代性符码的文字和数字始终在以教育的方式植入基层。年鉴学派强调今昔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当代的某些事件能够昭示历史上尚未被人觉察的联系。基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从教育赋能基层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百年乡村建设历史，以揭示“文字下乡”和“数字下乡”的连续性、必然性和挑战性。

一、长时段：结构变迁中的“教育-治理”共生逻辑

年鉴学派认为对人类社会具有长期影响的是长段历史，

即结构。“结构是一种网络构造，一种能干扰时间的作用并改变其范围和速度的实在，它同时起着支撑和阻碍作用。”^[1]长时段关注地理环境、社会基本结构以及文明形态的缓慢演变。

项目信息：2025年海南开放大学（海南省终身教育研究基地）科学研究课题“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教育参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HKJD2025(QN)-06）。

作者简介：熊孝康（1995—），女，湖南株洲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乡村振兴、终身教育研究。

（一）地理环境的稳定性

中国乡村在百年以前的长时段中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2] 固定的土地难以催生人口迁徙的内生动力，加之明清两朝的禁海令，封闭性成为中国农耕社会的重要特征。封闭的特征使农村经营相对简单，农业生产的经验大多以歌谣、谚语等形式总结，无须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

鸦片战争打破了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平衡。与此同时，工业渐次发展，城市开办诸多工业学堂。工厂受地理环境的约束少，事实上打破了土地对人的限制，催生乡村人员的流动。与工业匹配的教育不再是简单的生产经验传授，或专属于精英阶层的科举教育，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化的知识系统。为掌握新的生产技术，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文字下乡”成为乡村教育的前置条件。

进入信息化时代，数字作为实体世界的符号，方方面面植入生活、生产及学习的场景，并构筑起一个虚拟的结构。数字世界与地理环境形成两种结构，身处乡村的人一方面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足不出户就可遍览世界；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形成“数字鸿沟”，村民对数字结构的掌握能力不足。“数字下乡”不仅意味着要将新的技术植入乡村，同时也面临着将一个虚拟结构与实体结构整合的挑战。

（二）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运行长期以来依赖血缘的继替。通过嫡长子继承制、分家析产等制度，土地、房产等核心资源在家族内部代际传递。由于血缘天然具备如辈分、长幼的等级性和亲疏远近的差序性，以血缘为原点向外辐射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人情”、“面子”等非正式规则，构建起低成本的自我治理机制。当社会结构发生冲突时，往往是父权式教育首先发生作用。因此，传统中国社会实行的是“皇权不下县，县下是宗族，宗族皆自治”的国家统治与乡村社会分治的治理体系。

现代社会的运转以合作和契约为底色，这就意味着村民要以公民角色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文字既能自上而下传递信息，也能自下而上表达意愿，不再需要通过乡绅或是地方官员进行“翻译”。复杂经验和重要信息则需要突破时空限制，转化为可以长期保存的形式。“当前，社会信息经过数字处理并存储在非纸质质的载体中，通过网络通信、计算机或终端等方式再现出来的资源被称为数字信息。”^[3] 数字的灵活性和耐储存性大大超越了文字，可视为突破时空限制的文字升级版。“数字技术渗透在城乡社会生活的各个角度，社会性获得充分释放，与生产生活、政府治理、社会建设深度融合。”^[4]

（三）农业文明的转向

相较于地理环境及社会结构，文明形态的变化更为明显。以定居农业为基础诞生了农耕文明。乡村社会以血缘为纽带构建家族、宗族组织，强调孝道、等级秩序。教育内容与治理规则高度同构，均以维护血缘网络稳定性为目标，形成“经验-血缘-礼治”三位一体的稳定结构。工业文明的核心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技术理性为主导、能源革命驱动、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形

态。技术成为解决问题的核心手段，农耕文明的“自然时间”被“准时制”取代。教育以工具理性为主导，引入现代学科，培养技术人才。保甲制、土地改革等政策削弱宗族权威，将乡村纳入行政网格。信息时代的核心是以数据为核心资源、信息技术为驱动工具、知识创新为发展引擎。信息传播突破时空限制，形成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社会结构。知识从垄断变为开放，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以及享用者。数字技术既为教育提供工具，又为治理创造载体，二者在数据赋能目标下深度融合。

二、中时段：政策周期中的教育赋能模式迭代

中时段是连接长时段与短时段的桥梁，对历史进程起直接和重要作用，聚焦社会制度、经济周期等中等时间尺度的变化，在“文字下乡”与“数字下乡”中表现为政策工具的调整与治理目标的升级。

（一）知识分子的直接介入

在“文字下乡”的初期，政策工具以知识分子的直接介入为主。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深入乡村，通过开办平民学校、推广识字教育等方式，试图唤醒农民的自我意识，提升其文化素养。针对农村的“愚”、“穷”、“弱”、“私”，晏阳初提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5] 这一时期的教育赋能模式侧重于知识的单向传递，旨在打破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文化隔阂，为乡村的现代化奠定基础。由城市向乡村输送知识，将农民改造为城市人的模式没有触及土地分配的问题，无法从利益和身份上真正动员农民。

（二）政党领导下的探索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根据地开展乡村建设和革命。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曾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6] 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有力工具。通过组织农民学习农业技术、开展文化活动，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技能，还增强了他们的集体意识和革命精神。边区教育厅针对小学办学出台“民办公助”的教育政策，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性和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群众作为办学的主体，采用村民自治和组织文教合作组、学习互助组的形式提供人力、物资、财力方面的保障，进行办学与自我管理，办学类型包括半日校、夜校、冬学、扫盲班、“小先生”等形式。”^[7] 这一时期的教育赋能模式更加注重实践性和群众性，强调教育服务生产、服务革命的目标，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自上而下的推广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第一阶段是农村土地改革时期，借鉴陕甘宁边区的经验，通过冬学委员会动员群众，在农闲时节开展识字教育。1952年中央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各省设立专职机构，举办师资培训班，推动扫盲运动全国化。第二个阶段是农业合作化时期，1953年停止速成识字法，转向常年业余学校（民校），结合作业化运动统一学习与生

产。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8年推广山西万荣县经验，以《汉语拼音方案》为核心，通过“拼音－识字－普通话”三结合教学，解决扫盲巩固问题。“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扫除农村文盲4000多万人，1959年2600万人，1960年383.9万人。”^[8]这一时期的教育目标从文化启蒙升级为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服务，实现了从知识下乡到能力建设的转变。

三、短时段：个体行动中的教育赋能实践与张力

短时段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叙事方式，即以重大事件为核心的政治史、军事史等。在百年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教育发生的事实应当以不同的时间性进行描述。“历史应当是一首能够用多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9]

（一）定县实验

定县实验是由平民教育家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开展的一项以县为单位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以“平民教育”为理念，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旨在通过教育唤醒农民的主体意识，实现“民族再造”。定县实验的扫盲成效显著，平教会曾于1927年春进行全县文盲调查，大致情况如下：“全县人口约40万，其中文盲约27万，约占83%。1929年春举行第二次调查，文盲人数下降为占被调查人数的67%。1934年6月底，全县14-25岁的青年约有8.2万人，其中文盲占39%。”^[10]

定县实验之所以突出，在于其理念先进，且影响广泛。国民政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其中至少有3个议案采自定县实验。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11]定县实验的经验后来被推广到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乡村改造活动之中，成为当代世界发展中国家乡村改造运动的发源地。

（二）边区农村建设

相较于定县实验，民主革命时期在边区农村建设，用循序渐进的办法将土地重新分配，并且将党的组织延伸到基层，建立了群众性的教育组织，重新调整了乡村的社会秩序。通过利益动员、身份动员和情感动员，边区的农民意识到土地的分配不合理，自身应成为国家的主人和政治生活的参与者，重塑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边区农村建设由新型政党组织，注重土地制度变革、政策引导与组织动员，形成系统性解决方案。

（三）数字乡村建设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中要求综合考虑本地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参照使用，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注意探索适合本地区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乡村数字治理中，党的领导是核心保障，党组织应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数字治理规划。要加强对农民的数字素养教育，培养专业的数字治理人才。通过大数据分析、实地走访等方式，收集乡村的地理信息、人口结构、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数据，为数字治理方案制定提供精准支撑。

四、结语

乡村振兴是百年乡村建设的延伸，教育在基层治理中一直扮演着前置性、柔性的引导作用。“文字下乡”，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扫盲运动获得的成功，其根本在于撼动了长时段中的农村结构，与土地改革、政党下乡等实践一起改变了人与自然，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精英主导文化的现状。数字在超时空性方面是文字的升级版，其技术性和工具性特点显著。“数字下乡”的目标不在于改变农村的结构，而是以政策为导向，基于乡村实际，鼓励进行更多的实践，从而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使技术适配于乡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由于信息技术仍在发展，“数字下乡”是一个动态调整的政策，短时段中的标志性事件发生仍需要置于更广阔的时间段中观察。

参考文献

- [1] 保罗·利科(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21.
-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中华书局,2013:3.
- [3] 吴理财,李佳莹.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的百年乡村建设——基于政府治理的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23(2):6.
- [4] 刘威,梅晶哲.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百年村治的技术进阶[J].社会科学,2024(9):152.
- [5] 晏阳初.晏阳初全集[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482-483.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39.
- [7] 张晓晴.文字下乡与柔性动员:中国共产党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研究.教育学报,2010(1):110-111.
- [8] 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下).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1831.
- [9] 李小龙.重思布罗代尔历史时间理论的三个维度.近代史研究,2024(6):111.
- [10] 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408-409.
- [11] 徐秀丽.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安徽史学,2006(4):70.